

古漢語修辭學 論文集

呂叔湘題



譚全基 著



商務印書館
國際有限公司

古汉语修辞学论文集

对中国2000年来的古汉语修辞学理论、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系统、深入地阐述；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春秋繁露》《雅伦》《续锦机》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通过本书可一窥中国古汉语修辞学的全貌。

对明清的修辞理论及代表作品如《分类字锦》《艺概》等进行了细致深入地研究，发掘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观点，开拓了新视野。

附录中精选了50例古代修辞经典范例，如《璇玑图》《回文诗》《华山山形诗》等，意趣盎然，含义隽永。

CPI®

ISBN 978-7-80103-575-2



9 787801 035752 >

定价：29.80元

古漢語修辭學 論文集

呂叔湘題



譚全基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中 國 ·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汉语修辞学论文集/谭全基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08. 10

ISBN 978-7-80103-575-2

I. 古... II. 谭... III. 汉语—修辞学—古代—文集
IV. H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9876 号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GUHANYU XIUCIXUE LUNWENJI

古汉语修辞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编:100010)

电子信箱:cpinter@public3.bta.net.cn

出 版 人:程孟辉

责任编辑:段晓红

封面设计:付 强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 行 热 线:(010)65598498 电话、传真:65234023

编辑部电话:(010)65277381 传真:85113673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字数:276 千字

开本:889×1194mm 1/32 13.75 印张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公司联系调换

序 一

郑子瑜

要研究现代中国修辞学，不能不批判地接受过去。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加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古为今用”（郭绍虞先生语）。大家知道，中国修辞学的历史源远流长，自从先秦时代——中国修辞学的萌芽期开始，直至现代——中国修辞学的革新期为止，这期间，有关修辞学的资料，自零篇断简，以至于比较有系统和比较像样的专著，不断地被发掘和整理出来。但是可惜得很，大家对于这些资料的研究却做得很少，从修辞学史的角度去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说，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研究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学者们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古汉语修辞学的整理和研究有了新的成就，例如郑奠、谭全基二氏合编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汇集了中国二千多年来，由先秦至清代有关修辞学的各种资料。其中除辑录众所周知的名家论著之外，还辑录了许多一直不为人所注意的，以及一般人所不易看到的修辞论，为研究中国传统的修辞学和修辞学史提供了比较集中的资料。过去，这些资料比较分散，没人加以整理，研究者觉得非常不便。《汇编》的面世使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的研究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局

面。然而，资料终究是资料，要使它真正起作用，还得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还得继续不断地发掘补充，这就有待于修辞学者的共同努力。

要想把古代修辞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就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就是要大量收集资料，特别是发掘新的资料，并且用新的方法对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理论和资料紧密地结合，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谭全基先生近年来在古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工作方面，是有一定的建树的。一方面，他与郑奠先生共同编辑《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一方面他独力写作这本《古汉语修辞学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是他多年来艰苦钻研之后才写成的，可以说是理论和资料结合得较好的著作。

看了此论文集之后，人们会对他那踏实的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勤于发掘新的资料，如明代费经虞的《雅伦》、清代刘青芝的《续锦机》等有关修辞的重要著作，都是由他首次介绍出来的，是修辞学史料的新发现。其次，观点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地方。例如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般人只认识到它为封建王朝服务的一面，而论文集的作者却能从历史上著名的所谓“春秋笔法”中剔除其封建的思想，吸取其修辞技巧的精华，可说是修辞学上古为今用的例子。又如前人极不重视的宋代任广的《书叙指南》，作者却从修辞的角度去研究它，发现它是第一本修辞资料的汇编，既使《书叙指南》焕发出它的光辉，又扩大了古代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就是常为人们提到的修辞学专著宋代陈骥的《文则》，作者也深入地加以分析，并指出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此论文集范围甚广，从修辞理论、研究方法到新资料的发掘，都有较精辟的论述。

谭君出生于香港，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深造及从事研

究工作，前后凡十余年。在此期间，他曾师事修辞学家郑奠先生。近年谭君回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中文系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工作。此《古汉语修辞学论文集》为其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与其《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相辅相成。面世之后，将会引起人们对中国传统修辞学的重视，从而对此领域的研究工作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是可以预期的。

2008年8月

于新加坡

序二

要研究现代中国修辞学，不能不批判地继承过去。这就是说，我们不必加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古为今用。大家都知道中国修辞学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先秦时代——中国修辞学的萌芽期开始，直至现代——中国修辞学的新时期为止，这期间，有关修辞学的资料，自要不断积累，以至于比较有多位和比较多的著者，为不断的积累和整理和

郑子瑜教授手稿

序 二

袁 晖

光阴荏苒，流年似水。转瞬间，与全基先生澳门一别有十五个年头了。近日，全基先生来函，他的修辞学论文即将结集出版，要我写序。海天茫茫，思绪万端，遥望远方，献上我的心香一瓣。

(一)

1993年12月17日至20日，在澳门召开的“语言风格学与翻译写作国际研讨会”上，我见到了全基先生。在这难得的四天里，相谈甚欢。我们还共同主持了学术讨论，感受着学术讨论的滚滚暖流；在各种风味的饭店中餐叙，品菜名的修辞；在中外殊异的名胜前留连，发思古之幽情……短短的四天，有说不完的话语，谈不尽的课题。我们期许不久在香江，在黄山，在上海，在北京重聚，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整整十五个年头竟然缘悭一面！

1993年以前，我与全基先生已神交多年。早在1959年，我就读过他的最早的中国修辞学史方面的论文《中国最早的一部有关修辞理论的著作——〈春秋繁露〉》。在1975年他发出了“发掘古

汉语修辞理论宝库，对祖国二千年的优秀修辞学传统加以研究并发扬”的强烈呼吁。进入八十年代，我就陆续收到了他的《〈文则〉研究》《实用语文修辞十六讲》《修辞精华百例》《修辞新天地》等著作。80年代后期，我们有了一次愉快的合作，全基先生和我们一起编写了《汉语修辞学史》。这一切都使我受益良多，只是未能谋面，没有得到当面请教的机会，所以澳门会议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这样美好的四天，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有再一次相聚的一天。

(二)

全基先生原籍广东番禺，1931年出生在香港。1956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郑奠教授指导下研究修辞学。

郑奠教授是我国早期现代修辞学的著名学者。早在1925年，他出版了《中国修辞学研究法》。这部著作继承我国传统的写作体例和方法，汇集旧说，加上按语并配以实例语料以表达自己的修辞观点，其中选取前说和语料相当丰富。对于“比较法”“变易法”这两种研究法，特别着力，很有启发作用。此书对当时机械地吸收国外修辞学说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作为对当时外慕之风的一种对抗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50年代，在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就计划着要撰写中国修辞学史，经过了多年的劳动，他和全基先生编出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这本按时代、作者先后编排的五十五万多字的长编是研究我国传统修辞学和修辞学史的重要资料，材料之丰富，选取之得当，至今还无人超越。这是一部比较完善的，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修辞研究资料。

在全基先生看来，这些重要的资料，正是我们建立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有用的借鉴，也是我们研究汉语修辞学史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锲而不舍地从事修辞学史的研究。继对《春秋繁露》研究之后，他的《〈文则〉研究》在1978年又问世了。他提出《文则》是中国古代第一本修辞学专著。这是因为《文则》把修辞学作为方法论来研究，书中还有不少修辞的原则的阐发，对修辞手法、修辞与语法的关系以及文体风格等都作了探讨。他全面考察了《文则》之后，作出了不少精当的评价，对《文则》中比较法的分析也很值得赞许。他称道，陈骙用比较法来说明修辞的同一性、相异性、继承性和多样性，并且探讨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有一篇文章的前后对比，有不同体裁的著作对比，有古今著作对比，有的是同一意思不同表现方式对比，有的是不同意思用同一表现方式对比等等。这种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研究的深入和细致。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修辞学史上一些相当冷僻的著作的研究。如宋代任广的《书叙指南》，清代费经虞的《雅伦》，刘青芝的《续锦机》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他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热情的评述，对于后人研究古代汉语修辞学开拓了新的视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全基先生所进行的就是这种艰苦的垦荒工作、开路工作。

我深深感到全基先生在做古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工作方面很有历史眼光。早在1959年，在《中国语文》上读到研究《春秋繁露》的论文时就感受到他那总揽全局的“史”的观念，他把这部汉初的著作纳入到修辞学史的长河中加以观照，在论述宋代陈骙的《文则》中，指出那是中国古代第一本修辞学专著，认为中国古代是有系统的修辞学的，他把明代定为“纷争期”而不是“复古期”等等，都可以看出他独特的学术眼光。

所以我认为全基先生这本《古代汉语修辞学论文集》的出版，

对古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是会有有一定的帮助的，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也会给我们一些启发的。

(三)

转瞬之间，与全基先生一别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十五年前，会议的东道主程祥徽先生曾发出“今日盟师扬大纛，相逢笑谈满头霜”的感叹，现在又过了十五个春秋了，不知“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只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因教务繁忙，他要乘船赶回香港，在与全基先生握别的时候，真是眼看帆远去，心逐海水流，我的心中忽然响起了稼轩的名句：“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只希望我们都努力加餐，调养好身体，能够健康长寿，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也争取聚在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2008年8月

于京华帘青阁

自序

一 衷心的感谢

我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拓荒者，数十年来，我努力地为这个学科添砖添瓦。这本论文集首篇刊于1959年，末篇刊于1999年，跨越四十载。它们陆续发表于各学术刊物，由于时地久远，翻查不易，集中起来，方便参阅和批评。现在我虽然身处加拿大，但仍然心系北京，心系中国修辞学。

二十多年前，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教授为我题了书名，古文学家管燮初教授为我的文集题签，新加坡大学郑子瑜教授为我写了序言。那时候，三位前辈虽然只看到我部分著作，便已为论文集预先题签赠序，这是多么信任和鼓励！感激之情，非笔墨所能形容，只有铭铸在心中。

我出生于香港。1952年考进了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授课的都是一流学者专家，有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文学家楼栖，古典文学家王起，文字学家容庚、商承祚……这些教授热心教学，平易近人，在校园里，我学习到各种基本知识，包括语言学的和文学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知识，打下了研究古代汉语修辞学的基础。

1956年毕业，随即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习和

工作，后来升为助理研究员。这里都是一流的语言学专家：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郑奠、管燮初、周定一……这些研究员学识渊博，和蔼可亲。无论在饭堂里或劳动中，都可以问难，而且有问必答。在语言所里，我受到各位师长学术思想的熏陶，培养了踏踏实实的研究作风。吕叔湘所长就亲自为我们年轻研究人员讲授《马氏文通》，逐字逐句讲解讨论，还教我们英语。记得有一天，他来到我的桌子旁边，对我说：“我知道你的兴趣是修辞，你就跟郑奠先生吧！”他把我领进郑奠先生的办公室。从此我进入了人生真正的旅途，踏上了研究古代汉语修辞学的崎岖之路。

1973年冬，我回到了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中国语文研究中心，浸会学院，澳门东亚大学等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我继续进修，获得香港大学硕士学位（M. Phil.）。指导老师是单周尧博士和陈耀南博士，他们学识渊博，循循善诱，论辈分，他们是老师，论长幼，他们比我年轻得多了。

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所有的良师益友，更要感谢的是恩师郑奠教授。

二 郑奠恩师一点往事

郑奠先生是我的恩师。我自从1956年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后，在郑师的直接指导下学习和研究，耳提面命凡十余年，直至他1968年不幸病逝为止。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对我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大家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正是我国修辞学的启蒙时期，有识之士纷纷向多方面寻找建立修辞学的途径。有的热衷于外国修辞学，有的热衷于中国传统修辞学。那时期，郑奠老师在北京大学

等学院讲授修辞学，并早于1925年便撰写了《中国修辞学研究法》一书（约十六万字）。这可算是提倡中国传统修辞学的最早的著作之一。《导言》明确指出“述先士之正论，考前文之成规，范为修辞之学，先陈研究之法”。这就是主张研究古人的优秀的修辞理论和方法（“正论”“成规”）。再看下面一段话：

文质迭代，迁化随世，方术多端，因革适变。是以前文成式，未必悉为后世之范，来者有作，亦难废往代之准。兹所述征引为多，或理论可从，或篇章足效，是在善学之士拟议以成其变化耳。（导言）

此书由于时代的限制，缺陷在所难免，但它指出：对待前人的学说，既不要全盘接受（“未必悉为后世之范”），也不要拒绝继承（“亦难废往代之准”）。这就是今时所称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意思。它进一步指出：修辞学说是变化发展的，人们要“因革适变”，并且要主动地促“成其变化”。这就是今时所称变化创新的意思。这是对待修辞学遗产的正确态度。

当时有学者批评此书为“复古”（见《修辞学发凡》第十二篇），后来学者多沿用此说。研究传统修辞学的学者，本来就如凤毛麟角，这时更为不多了。直到1965年郑子瑜教授发表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二万五千字），才又敲起了钟声，引起人们对研究的重视。

郑师写了《中国修辞学研究法》之后，三十年来，孜孜不倦地积累资料，筹划编写中国第一本古汉语修辞学的资料汇编，一如既往，为开发传统修辞学的宝库而尽力，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对这本写于1925年的著作有新的评价。袁晖、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1990）说：“作者提倡学习民族的修辞学遗产，这是值得肯定的”，没提“复古”。评论得较为客观的则为袁晖教授，他说：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是海外修辞学大量涌入的时期，它的出现作为对外慕之风的一种对抗，是有一定意义的。特别是作者搜集引用大量的成就和丰富的语料，对于开发传统修辞学的宝库是有贡献的。

（《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2000年）

袁晖教授能历史地评价此书，既肯定贡献，又指出缺陷，也不提“复古”，故是中肯的评价。（如果郑师能看到上述评价，在天之灵，应该可以释怀了。）

三 中国第一本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诞生的历程

学术研究的道路从来就是崎岖的。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就在恩师郑奠领导下编写《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郑师一向认为中国的修辞学传统源远流长，资料丰富，要继承它就要研究它，要研究它就要有资料。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资料就隐藏在里面，把分散的集中起来，把埋藏的发掘出来，将大大地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

当时研究人员中有点重研究工作轻视资料工作的风气，认为研究工作，写论文写书高人一等，而资料工作繁琐吃力，无论多好，也只为他人研究铺路。郑师非常重视资料工作，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

本编希望尽到一点“后勤”的责任。

（《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前言）

郑师热情工作，首先基于“责任”感，以发扬传统修辞学为己任。而且只是“一点”的责任，而且是“后勤”的责任。他这谦逊的

态度、踏实的作风，令人敬佩。他有远见，认为要研究传统修辞学，必先从搜集资料做起。他还进一步说到“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没有资料，研究只是空话，继承就更是空话了。我们的工作，虽是“后勤”，其实是先锋。

郑莫老师博览群书，治学勤谨。他要把他一生的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全部编进这部汇编里。在他的书房里，有十多柜线装书，有几十本笔记本（封面都写着“札记”两个毛笔字），有大量笔记卡片。（这些珍贵资料，文革时全都没有了。）对这汇编工作，他是胸有成竹的。

说实在的，参加此专题工作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郑师，一个是我。后来再加上一位老先生当抄写（临时工，按字数计酬）。那时我刚毕业，埋头古书堆，觉得很新鲜、很兴奋，遇到的困难虽然不少，但是满腔热情，认定自己正在干着前人未干过的事业，为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而献出青春。郑师是古汉语史组副组长，又兼学术委员，杂志编委等，事务繁忙。工作开始，首先是制定原则，访查书目。我奔走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语言研究所图书馆之间，又跑遍大街小巷的故店铺，逐字逐句地寻找古代“修辞学”。有时一整天也找不到有用的一言半语；有时顺藤摸瓜，辗转追寻，如滚雪球，皆大欢喜；有时竟有新的发现，哪怕是一句话、一本书，就惊喜若狂。几年的披沙拣金的劳动，惊醒了沉睡在大地的宝藏。经过查书、缮录、校勘、标点、编排等细致的工作，1962年完成八十万字初稿。周定一教授协同修订，1965年精选为五十五万字的稿本完成了。但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郑师健康一向不太好。我在他病榻旁边，他不止一次嘱咐我一定要完成这汇编，并且一定要出版这汇编。对此我是铭记于心的。当时由于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修辞学，不赞成出版。讨论多时，意见仍未统一。文化大革命到了，知识成果不受重视，稿